顾炎武北游事迹发微

赵　刚

在明清之际诸学术大师中，顾炎武的生活经历尤为特异。他从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离家北游，在北方地区活动了二十五年，最后客死于山西曲沃。这种情况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讨论，主要立论根据是清初潘耒刊刻的《亭林文集》。潘耒在当时刊刻其师顾炎武的著作，有助于顾炎武著作的保存和出版，但因顾忌很多，对原书多有窜改，删节，给后世研究顾炎武造成材料上的缺憾。顾氏北游的若干问题，即因史料有阙，难以进行深入的探讨。

五十年代末，顾炎武佚失多年的重要著作《蒋山佣残稿》重新发现，并由中华书局收入《顾亭林诗文集》公诸于世。此书收录了顾炎武的大批书信，其中一部分是首次问世，一部分虽见于潘刻本，但保留了不少为潘刻本所窜改，删节的段落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从写作时间看，这批书信多写于顾氏北游期间，保存了许多潘刻本所没有的重要内容，为深入研究顾炎武北游的前因后果提供了新的材料。笔者根据是书，辅以其他史料，重新探讨顾炎武北游期间的两个问题。

一、顾炎武北游与家难的关系

顾炎武在《从叔父穆庵府君行状》一文中写道："余即为宵人所持，不敢遽归，而叔父年老，望之弥切，贻书相责，以为一别十有八年，尔其忘我乎！炎武奉书而泣，终不敢归。而叔父竟以昭阳赤奋若之春二月甲寅，弃我而逝"①。

由此可见，顾炎武北游是为"宵人"所逼。这位"宵人"曾和顾炎武发生过激烈冲突，后来迫使顾炎武背井离乡，被迫北行，直到十八年后，仍使他心存余悸，不敢南归。这位迫使顾炎武北游且不敢"遽归"的"宵人"是谁呢？从清代学者全祖望、张穆到当代学者王蘧常、赵俪生诸先生都认为它是顾炎武的乡邻叶方恒，换言之，叶方恒的迫害是顾炎武北游的主要客观原因。②

叶方恒迫害说最早见自归庄《赠顾宁人北游序》。此文详细叙述了顾叶交恶和叶方恒迫害的前后过程。

"宁人故世家，崇祯之末，祖父蠡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馆，一时丧荒，赋徭蝟集，以遗田八百亩典叶公子，券价仅当田之半，仍靳不与。阅二载，宁人请求无虑百次，乃少畀之，至十之六，而逢国变。（公子）产逼宁人，见顾氏势衰，本蓄意吞之。……宁人之仆陆恩得罪于主，公子钩致之，令诬宁人不轨，将兴大狱，以除顾氏。事泄，宁人率亲友掩其仆，执而棰之死，其同谋者惧，告公子，公子挺身出，与宁人讼，执宁人囚诸奴家，胁令自裁。同人走叩宪副行提，始出宁人。……公子愤怒，遣刺客戕宁人，宁人走金陵，刺客及之太平门外，击之，……会救得免。……宁人度与公子讼，力不胜，则浩然有远行。"③

序中提到的"公子"即叶方恒。从序中可以看出两点：(1)顾叶交恶的原因是双方经济纠

纷。(2)叶方恒的屡次迫害是顾炎武北游的重要原因。归庄是顾炎武的挚友，叶方恒迫害顾炎武时，曾挺身而出，竭力营救，并致书叶方恒，劝他停止对顾炎武的迫害。④归庄既然是顾叶交恶的调停者和见证人，他的记载无疑是可靠的一手材料，全祖望、张穆等据此探讨顾炎武北游的原因，是有一定根据的。但是，《蒋山佣残稿》提供的新材料表明，完全把顾炎武北游原因归咎于叶方恒的迫害，有些史实是无法解释的。

《蒋山佣残稿》收有顾炎武给叶方恒的两封信。其一云："同善之举，劳民劝相之政寓乎其中。老年翁欲以一邑之化，推诸海寓，其用心远矣。谨当奉扬仁风，播之四国。"⑤其二云："才入署中，未便外出，年兄至此而不得一晤，真交臂失之矣。……（弟）此时不过借关防为著书之便耳。……绌葛之惠，敬佩雅爱，对使拜登，尚容面谢。贵治有旧家卖书者乎？如有千百卷书，可佐名山之藏者，则当携资以来矣。"⑥

据王蘧常先生考证，顾氏这两封信均写于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和前引《从叔父穆庵府君行状》成文时间相距不远。⑦信中一称叶氏"老年翁，"一称"年兄"，高度评价其政绩，并托他代为访书。顾炎武到山东后，叶方恒亦曾派人间侯，并亲自登门拜访，赠予礼品。此时，顾炎武对那位逼自己北行的"宵人"仍然恨恨不已。如果说叶方恒是顾炎武被逼北游的主要元凶，顾炎武能和他称兄道弟吗？会到其"治下""携资"购书吗？看来叶方恒迫害说很难完全解释顾氏北游的客观原因。另外，从顾炎武致叶方恒的信中所表现出的交往程度看，双方关系在此之前已有相当的改善，这在归庄给顾炎武的两封信中也可以得到证实。其一云："兄之仇雠，行且入都；故乡之人，妒极生怜"。⑧其二云："戊申春夏之交，……岁月既久，怨仇已释；且今年仇家已尽室赴任，更无所虑。"⑨

据赵达之《归玄恭先生年谱》永历十四年（1660）条，归庄此年"渡湖至洞庭"，⑩和第一封信中"年来强半在洞庭山中"行止相吻合，则此信当写于此时。戊申年是康熙七年(1668)，从信中内容推测，此信写于康熙七年。这两封信恰好可以证实我们前面的推测，顾叶双方在康熙十二年(1673年)之前即已改善，这种改善从顺治末年已经开始。顾炎武在顺治末年江南之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。顺治十七、十八年(1660、1661年)，顾曾南游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等地，返乡探访。如果叶方恒对他穷追不舍，这次南行恐怕难以如此顺利。随着顾叶关系的改善，顾炎武的南方之行不仅异常顺利，还出现回乡安居的可能性。上面引用的归庄致顾氏的两封信中心内容就是劝他返乡定居。其二云："柳子厚窜南方，惟以不得上丘幕为恨，谓其先祖曾不若马医夏畦之鬼，犹得享岁时之祭。彼以得罪不能归，兄今欲归，其孰御之？独无丘墓之思乎？此又平生故人所悬悬于怀者也。"⑪

归庄的这两封信和前引《送顾宁人北游序》是否矛盾呢？回答是否定的。根据《送顾宁人北游序》的内容推测，此序大概作于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北游之际，归庄致顾氏的第二封信写于康熙八年以后，其间相距十余年，时过境迁。况且顾炎武北游后，归庄一直留在江南，对叶方恒的态度和情况自然远较飘泊异乡的顾炎武了解真切，他对顾、叶关系的新看法同《送顾宁人北游序》的记叙具有同等参考价值。既然顾叶关系早在康熙初期已有改善，甚至出现返乡定居的可能，那么，把顾氏北游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叶方恒迫害，这是否有些片面呢？既然到康熙十二年前后，叶方恒已不再成为顾氏返乡定居的障碍，那位逼使顾炎武不敢还乡的"宵人"又是谁呢？是否同顾氏家难有关系呢？

最早注意到顾氏家难的是王蘧常和赵俪生两先生，遗憾的是，他们都未把它和顾炎武北游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分析讨论。据顾炎武的养子顾衍生记载，崇祯十四年（1640年），他的从

叔父顾叶墅，从兄顾维“构家难”。⑫《蒋山佣残稿》卷二《再答从兄书》（原注：讳维）内云：“今兄曰：主持有人，同谋有人，吾无与焉。…苟曰事不由身，何异盗钟之惑。“⑬这足可以证明顾衍生记载的可信性。顾氏家难的根源是什么？基本经过、造成后果是如何呢？据顾炎武《顾氏谱系考》和张穆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，顾家从曾祖父章志到炎武四代世系可列为下表：

顾章志——┌绍芾——同吉——绝嗣
　　　　　└绍芳——同应——炎武等五子

武同应家境“虽贫，好施与”，生有五个儿子，炎武是次子。顾同吉“产颇饶”，早卒无嗣，过继炎武为子，遗产自然由炎武继承，从而引起同族兄弟的觊觎和争夺。⑭根据顾炎武的家族结构、经济状况分析，这场内讧的焦点必然是顾炎武承袭的财产。早在崇祯十四年之前，顾炎武的生父、养父、本生祖父都已故世。十四年，嗣祖父绍芾去世。他的那些族人不甘心顾炎武独自继承养父同应的丰厚遗产，自然就掀起内讧。内讧的细节和后果在前引《再答从兄书》中有所透露：

“孰使我六十年垂白之贞母，流离奔迸，几不保其余生者乎？孰使我一家三十余口，风飞雹散，孑然一身，无所容趾乎？……孰使我诸父宗人，互寻仇隙，四载讼庭，必假手剪屠而后快者乎？……孰使我倍息而举，半价而卖，转盼萧然，伍子吹篪，王孙乞食者乎？……孰使我父母之国，邈若山河，凡我姻友，居停半宿，即同张俭之辜；接话一茶，便等陈容之僇，绝往来，废贺吊，回首越吟，凄其泪下者乎？……况宝玉大弓，未归鲁库；法书名画，尚在桓玄，……且贞母何辜，遂同抄没；……俾老母得以粗粝终天年，而八口不至填沟壑，其何乐乎与同枝为不戴之仇也。”⑮

这是目前现存顾氏家难最重要的史料，它提供下列详细情节。（1）它证实了上述顾氏家难源于财产纠纷的推测，从信中可见，双方争夺是异常残酷、激烈的，顾氏大部分财产被人侵占，损失惨重。这在他的诗亦有所反映，如《赠路太平光禄》：“落箕栽十亩，覆草只三盈。”⑯《赠刘教谕永锡》“百口零落余从仆”⑰（2）他在无意中披露了母亲去世的真相。顾炎武在许多文章中称其母是在明亡时以身殉国而死的。从此信叙述看，他似乎隐匿了事实的真相。他的母亲极有可能是家难中的牺牲品，否则，他不会无故言及“俾老母得以粗粝终天年，而八口不至填沟壑，其何乐乎与同枝为不戴之仇也。”（3）顾氏族人是逼迫他背井离乡的重要元凶。从信中可以看出，他的族人不仅侵夺他的财产，逼死其母，而且不择手段，竭尽排挤之能事，使“凡我姻友，居停半宿，即同张俭之辜，接话一茶，便等陈容之僇；”甚至在顾叶交恶，外姓相逼的情形下似仍然落井下石，其中具体情况，虽不得而知，但顾炎武事后“奴隶鸱张，亲朋澜倒”⑱的痛苦回忆足以证明这一点。在这种遗产被夺，养母被逼而亡，同族迫害不已的严酷形势下，早在顾叶交恶之前，他已感到无法在家乡立足了。“畏途穷水陆，仇雠在门户；故乡不可留，飘然去远方”。⑲顾氏的这几句诗恰恰说明了这一点。至于顾叶交恶，根本原因亦能追溯到顾氏族人的迫害。顾氏在前引信中提到“倍息而举，半价而卖”，就现存史料看，这种交易只同叶方恒有过一次。换言之，如果没有顾氏族人的迫害，就不会发生顾炎武低价售田之事，也不可能给叶氏带来可乘之机，引起顾、叶交恶，从而不致于使顾炎武背井离乡，被迫北游。

综上所述，导致顾炎武北游的主要原因是顾氏家难引发的对他的迫害，叶方恒的乘人之

危则是次因和直接原因，其肇事的根源仍在顾家内部。即使没有叶方恒的迫害，顾炎武离家出走也是必然的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。甚至在顾炎武北游之后，和族人的对立依然存在。他去世前不久，想替养母在家乡修祠以示纪念。结果，他的同族“横加阻挠，如毳如挥，”使他大伤脑筋，“日夜痛心”。⑳他晚年虽有思乡之情，也只想回去探访，并无定居之念。只是由于在关中受到士绅排挤（详后），万不得已，曾动过这个念头，但最终仍然是先选择华阴而后选择曲沃作为安度晚年的落脚点，家难的阴影似乎伴随着他整个后半生，这从另一角度说明，顾炎武之所以不敢南归，主要作祟者是他的族人，而非叶方恒。至于叶方恒，他同顾炎武的冲突是顾氏家难的延伸，除经济纠葛外，不存在类似顾氏族内的“不戴之仇，”一旦时过境迁，自可言归于好。弄清顾氏家难和叶方恒迫害的主次关系，顾叶双方从仇敌到和解的剧烈转变之谜也就涣然冰释。当然，顾炎武北游除了家难等客观原因外，还和他崇尚古人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学术抱负是分不开的。关于这一点，业已超出本文论述范围，此不赘论。

二、顾炎武旅卒曲沃发覆

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顾炎武离开华阴前往曲沃。次年春，在当地病逝。他此行的目的何在？据李因笃《与顾太学》所述，顾炎武此行“将有菟裘之计矣。”㉑“菟裘”一典见诸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，意谓养老之所。换言之，顾炎武到曲沃是想安居的。据顾衍生记载，顾炎武到曲沃后，为顾衍生“议婚靳氏，”㉒ 顾衍生订婚似乎可以视为分析顾炎武何处定居的重要线索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顾炎武准备定居关中。李因笃征询顾炎武的意见，准备替顾衍生办理婚事。顾炎武没有公开表态，“中心愿之”，㉓予以默许。第二年，因对定居关中的计划有所犹疑，就把给衍生订婚之事搁置起来。㉔顾炎武此次曲沃之行，若无养老定居的打算，恐怕不会给顾衍生在此轻易定婚吧？从这可以看出，李因笃不枉为顾氏的平生知己，对他的衷曲知之甚详甚确。

曲沃是顾炎武在北方选择的第三个，也是最后一个落脚点。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北游后，一直想在北方找一处可靠的安度晚年的落脚点。康熙七、八年间，他把它定在山东安邱的大桑家庄，后因黄培诗狱的牵连而被捕入狱，经外甥徐乾学和好友李因笃等人的营救方才脱险。他经过此事，深感山东环境险恶，只得放弃经营山东的打算。入狱前，他曾出游关中，结识当地名士李因笃、王山史等人，并有“卜居关中”之约。㉕此后，他活动的重点逐渐西移。康熙十八年，他二次游历关中，印象极佳。称赞：“秦人慕经学，重处士，持清议，实与他处不同。……黄精松花，山中所产，沙苑蒺藜，止隔一水，终日服饵，便可不肉不茗。然华阴绾毂关、河之口，虽足不出户，而能见天下之人，闻天下之事，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险，不过十里之遥；若志在四方，则一出关门，亦有建瓴之便。”㉖他因为有这么多有利条件，正式决定定居关中，并通知了在京做官的徐乾学兄弟，“关中侨寓，……足遂优游，已定菟裘之卜矣。”㉗这是他选择的第二个落脚点。可是，两年之后，他似乎改变了定居关中的计划，在给李因笃的一首诗中称“上国尚环辙，浮家未卜居。”㉘这首诗作于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，假如他没有改变原定计划，“浮家未卜居”又从何说起呢？

那么，顾炎武为什么放弃了考虑了十多年的计划，在康熙二十年改到曲沃定居呢？今人赵俪生教授把它归咎于清代名将、甘肃提督张勇、张云翼父子胁迫所致。他说：“康熙十八

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张廷尉云翼半夜告访.……顾不晓得接到了什么样的信息,只好突然离开华阴，死在山西曲沃去了。"㉙张氏夜访是十八年底,顾氏最后一次到曲沃,并死那里是二十年七月，中间相隔一年半，这二者果真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吗？似乎不一定。《蒋山佣残稿》卷二《致汤圣弘》云："向有栖迹华山之愿，因烽火乍传，暂居汾曲。近者风鹤稍宁，而关中诸君子重理旧说，将建考亭书院，以奉先儒，并为老人著述之所。弟亦欲藉此以作菟裘。"㉚据张穆考证，顾炎武于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十月"携衍生经汾州之阳城里"，㉛同信中"暂居汾曲"时间相合，可知此信当作于是年。同年寄赠王锡阐诗中称："平生四海心，竟做终南老。"㉜很明显，顾炎武并未因张氏父子的威胁，改变定居关中的计划。这种威胁是不是来自张氏父子之外的政治势力呢？也不是。三藩之乱爆发后，清政府开博学鸿词，修明史，采取各种措施，笼络当时的士大夫。顾炎武在此之前就是清廷重点对象，早在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清政府就有意邀请顾炎武修明史。十七年，清朝又通过叶讱庵、韩荚等人邀请顾炎武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。与此同时，甘肃、四川、陕西等地的地方大员纷纷派人游说顾炎武，想把他罗致幕下。㉝他对此一概谢绝，为避免同清政府发生正面冲突，采取了以游为隐的策略。他在给弟子潘耒的信中写道："盖此时时事,不得不以逆旅为家,……若瑰处关中，必为当局者所招致而其笼络，又岂能全其志哉？"㉞

康熙十八年，在清廷频频拉拢的形势下，他对定居关中的计划有所犹疑，并不再让李因笃为养子衍生操办婚事。为避开"帅府"招致，出游豫西，"历崤函，观洛、汭，登太室，游大騩。"㉟但豫西之行一结束，又恢复了原来的决定，定居关中，并如前所述，通知了徐乾学兄弟。

我们认为，顾炎武和关中士绅关系的恶化是导致顾氏改变主意的主要原因。顾氏起初对关中印象极好，和当地士绅关系密切。可是，随着对关中了解的逐渐深入，他对关中开始从希望转为失望，首先，风土民情比原设想的逊色，华阴"土瘠差烦，地冲民贫，"㊱民风不佳，赌博盛行，㊲"若有余房一二间，便为赌博之局矣"㊳且"地处僻远，事事不便，"㊴因此"局面甚少"。㊵其次,当地士绅起初和他来往密切，对他较为尊重。华阴县令迟维城还亲自送迎他进出城。㊶另一位县府要员刘太室（顾信中称其为"刘太室父母"似可证实这一点）和他交情甚深，是继李因笃、王山史之后他在华阴的东道主。㊷朱子祠堂竣工后，形势发生了变化。当时，顾炎武同王山史等人在华阴筹建朱子祠堂，工程开始后，当地绅士态度冷淡，"多口纷呶，有不欲弟与君共事者，又有贻诗阻止者。"刘太室在祠堂竣工后，在致顾炎武的信中对此事只字不提，引起顾炎武的强烈不满。顾回信指责他"阳托慕道之命，""阴行逐客之令。"㊸李因笃远在富平；王山史早在康熙十九年三月业已离陕南游。他家因赋税苛重，"家计日落，"㊹对于"北方往来，寄食于人"㊺的顾炎武难以继续资助。顾炎武在关中当时似陷于孤立境地，难以在当地立足。山西曲沃和华阴仅一水之隔，当地官绅熊撰、黄斐、卫蒿等人和他过从甚密。㊻在这种形势下，他自然放弃华阴，选择曲沃作为新的、也是最后一个落脚点。关中士绅为什么要排挤顾炎武呢？这或许同当地士绅对他的嫉妒很有关系。顾炎武有《与人书二十二》，其中第十二封信谈到时人对他的看法："吾辈学术，世人多所不达，一二稍知文字者，则又自愧不如。不达则疑，不如则忌。"㊼据顾衍生《元谱》记载，这批书信著于康熙十八年，正是顾炎武积极筹划定居关中的前后。当地士绅在和他接触、交往过程中，或因学术及其他原因产生疑忌之心，最后借修朱子祠堂一事对他大肆发难，最后迫使他离开华阴。

总之，康熙二十年顾炎武曲沃之行，目的是寻找新的落脚点。这并非清朝中央或地方政府逼迫所致，很可能是顾炎武在当地士绅排挤下被迫做出的新选择。

①《顾亭林诗文集》（北京.中华书局，1983）（以下均简称《顾集》）页162.

②从全祖望《亭林先生神道表》（详参《鲒埼亭集》），张穆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到今人赵俪生教授都忽略了顾氏家难及其对北游的影响。王蘧常《顾亭林诗集汇注》、赵俪生师近著《顾亭林与王山史》首次提到顾氏家难，但缺乏进一步探讨。

③④《归庄集》（北京中华书局，1984）页232、319—320.

⑤⑥⑳同①页201.204.81 .

⑦⑫王蘧常《顾亭林诗集汇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）页1317.1294

⑧⑨⑩⑪同③页339.323.557.

⑬⑮⑯⑰⑱⑲同①页193.313.305.56.294.

⑭详参张穆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万历四十年癸丑条.

㉑李因笃《续刻受祺堂文集》.

㉒转引自张穆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康熙二十年九月条。

㉓㉔㉖㉗㉘同①页210.168.87.214.426.

㉕李因笃《旧年宁人先生以无妄系济南，走书报我，触暑驰视，苦疾作，辞还，先生寄赠三十韵诗。春日晤保州，重会蓟门，奉答前诗广五十韵》，转引自邓之诚《清纪事初编》卷八"李因笃"条.

㉙赵俪生《顾亭林与王山史》（济南，齐鲁书社，1986）页65—66.

㉚㉜㉞㉟同①页206.422.79.199.

㉛张穆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康熙十九年十月条.

㉝详参《顾集》页87、208，张穆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康熙十七年条.

㊱㊲㊳㊴㊵同①页192.81.215.214.

㊶张穆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康熙十八、十九年条.

㊷㊸㊹㊺㊻㊼㊽同①页87、216、213、214、210、192、94.

（上接第32页）

㉓《清宣宗实录》，卷365，第31页a.

㉔《通山县志》卷三，政务志，兵事.

㉖《清宣宗实录》卷366，第13页.

㉗㉘《清宣宗实录》卷366，第20页a.

㉙《湖北通志》卷七十，武备志八，兵事四.

㉚黄钧宰《金壶七墨》卷四，漕变.